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生态政治意蕴

方世南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吴智库/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 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科学论断, 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需要和时代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结合中国资源、环境、人口实际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说, 其鲜明的生态政治意识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何谋划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重大生态政治问题, 以明确的生态政治使命彰显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要以绿色化、低碳化发展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内在要求的强烈生态政治责任, 以清晰的生态政治实践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高质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好生态政治蓝图。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生态政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 A 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3)05-0025-07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3.05.004

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 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 (PP. 49—50)。这一科学论断, 充满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策意识、前瞻意识和政治意识。鉴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自然生态与政治生态紧密联姻趋势在新时代的日益清晰明朗性,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就作为一项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政治任务。生态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 还反映了重大的民生问题, 而民生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治问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为指导, 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要牢固地确立将生态环境问题当作是直接关系着党的初心使命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及直接关系着民生幸福安康的重大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精心呵护好大自然,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要求的崇高政治使命,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 以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展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共赢的绿色经济社会这一全面超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厚成就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口优质均衡型社会、生态安全健康保障型社会的巨大发展优势, 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作出新贡献, 蹄疾步稳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是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有着鲜明的红绿交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观, 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

[收稿日期] 2023-04-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

[作者简介] 方世南(1954—), 男, 江苏张家港人,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和生态文明研究

治学中的重要观点。“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推进社会在全面地克服自然异化、社会异化、劳动异化、资本异化、人的异化等现象而朝着绿色化、人文化、安全化、持续化方向发展的重大理论指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博大精深，既涉及人与社会关系推动的社会发展，又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推动的社会发展，将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两者紧密联结起来综合性考察社会系统的全面协调整体性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要在自觉地探索和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现代化客观规律基础上发展的重大价值诉求，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超越了以往所有思想家提出的社会发展学说而显示出深刻的真理性。

将生态问题始终与政治问题紧密地关联起来研究社会整体性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特色，是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人文性、持续性、整体性的重大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社会发展时，始终注重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姻关系，始终注重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协调好的两大类关系，始终注重将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作为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十分重大的价值诉求和价值旨归。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人们对这两大关系的认识必须上升到将生态与政治紧密联姻的生态政治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层本质以及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诸多复杂多样的关系都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和派生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在现实社会中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存在物。因而，人的本质也体现了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两者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人的有机的身体，另一个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自

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身体只有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生活产品才能存活。从人的无机的身体方面看，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161）任何事物的属性和事物的本质都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以及内在关系看，人的自然属性反映了人的自然本质，人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本质。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也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不能脱离人的自然本质而只是强调人的社会本质，也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本质而只是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将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或只是看到人的一种本质而无视、忽视人的双重本质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P560）恩格斯用“兽性”来表达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本质。他认为，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永远摆脱不了兽性。“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P106）随着人类理性的增长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会越来越强，但是，人类除了具有强大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外，还具有必须接受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制约的受动性。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有机结合是人的重要特性，也是我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须高度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因素。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呵护自然，人类如果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也是人类敬畏生命、敬畏自身的重要表现。为此，人类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必须将目光同时聚焦于客观外部世界和主观自身世界，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两大提升，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3]（P422），只有实现了

这两大提升，人类才能不断地确证自己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最终实现两大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P63）。只有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才能充分体现出人类社会所要达到的关于实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2]（P209）的理想目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要追求实现的协调平衡关系，又深层次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要达到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决定的，而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民生幸福安康都体现出重大的政治性。从生态政治学说的高度来看，一切生态环境问题，都反映了由政治理念、政治路线、政治决策、政治行为所决定和影响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从生态政治的高度分析生态环境问题，才能揭示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也才能从以实际行动讲政治的高度，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会成为影响国计民生、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重大政治问题，从深层次看，都是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政治路线、政治方针紧密联系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都存在着对其产生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诉求、政治价值和政治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正视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从政治的高度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为指导，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将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清醒的政治自觉以及高度的政治站位，注重考察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的政治导向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1]（P51）的政治高度，以绿色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P51），“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1]（P52），将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建立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和基础上，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举措构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有机结合的新格局，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命安全、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篇章。

二、“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体现了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政治站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色和本质要求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色和本质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面鲜艳的旗帜。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色，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遵循的本质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突出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鲜明政治性，由此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这一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重点任务、存在问题和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愿景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内容所决定的。从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问题观。问题是时代的响亮声音，直面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认识论和生态政治实践论的最根本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专门提出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一重要观点，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1]（P20）。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指出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时，客观如实地得出了“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1]（P14）的结论，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因此，“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就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也是充分彰显出鲜明实践导向的科学论断。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最为重要的特色，就体现了高度的政治站位，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挥着根本性的政治保障作用。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价值取向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绿色发展问题上所始终坚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使命和政治宗旨。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存在着巨大压力，必须从生态政治的高度予以充分认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要推动 14 亿人口的大国整体性地迈进现代化，如果不能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不能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必然会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在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承载力有限而经济增长和消费具有无限性趋势的态势下，人口规模巨大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的影响势必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更需要特别注重的是，作为关系到“民以食为天”的重大问题的农业风险会持续加大，粮食安全形势会日趋严峻。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世界百年巨变等多重挑战，各种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传导性出现了明显增强的趋势，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将中国人民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的任务十分艰巨。从总体来看，我国抵抗和应对农业风险的综合能力还比较弱，农业风险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应对农业风险和确保粮食安全的认知上，无论是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存在着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普遍不强，靠天吃饭的思想意识还根深蒂固的现象；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近几年的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仍然不够，投资渠道较为单一，投入和建设标准普遍较低，缺少有效管用的长期管护机制，与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农业风险和粮食风险的风险预警能力上，多

以事中风险控制和事后风险管理为主，而对于事前风险防控的重视程度不足；在农业保险方面，保险面还不够，许多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率低，粮食产品保险地方配套压力较大，农业保险应收保费问题较突出，农业保险经营成本高，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在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面，管理工具尚未有效应用，气象指数保险作用未充分发挥，“保险+期货”模式相关配套机制还不完善，非常规风险事件的控制工具欠缺，农业风险管理科研能力还存在诸多不足，农业科技推广存在资金匮乏、途径单一现象，农业保险行业科技化建设尚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在发展中必然会引发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古人早就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朴素生态政治理念。时至今日，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有了迅猛的进步和广泛的应用，但是，“风调雨顺”这个良好的自然生态，仍然是构建“国泰民安”这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和重大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密切关联着的，需要从生态政治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对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价值指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财富，推动实现民富国强，才能在人类文明形态上超越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实现所有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群众的共建共享，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地协调并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着力推进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有机统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是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有助于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自然基础。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保护好自然环境，培植生态价值，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充分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提高共同富裕的程

度。要求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绿色财富的增长,在提高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提高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程度。还要求大力促进慈善事业的绿色转向,推动慈善事业从关注人与社会关系转向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化发展,促使慈善事业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友爱方式,发展成为一种在注重社会共同体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发展的道德行为,推动社会伦理与环境伦理实现有机结合,使慈善事业既成为助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一种强大力量,成为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构建的一种强大动力,也成为在协调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中促进社会文明全面发展的显著标志,这些做法都会推动生态民生改善从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也需要从生态政治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对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平发展概念虽然有着特定的所指,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仍然有着生态政治的价值诉求。因为,能否构建全球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直接关系和影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是最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治理也是人类共同的重大任务。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环境治理也离不开中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政治意识还是生态政治实践都是开放性的和全球性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生态安全”、“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都是以一种胸怀世界和面向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提出来的反映全球价值共识的重大理念,充分体现出“类意识”、“类主体”、“类合作”、“类发展”等国际精神和人类情怀,都充分彰显出生态政治的国际性、现实性、未来性特征。

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展示了以绿色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政治美好图景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是紧密联系着的,两者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才能以崇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责任以及政治行动自觉地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整体性的高质量发展,也才能展示出以绿色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政治美好图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则更加突显了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和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导向。

其实,生态文明本身无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我们之所以要使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就是要突出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在于要着力彰显出将生态文明与政治紧密关联起来的生态政治特性,要着力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要着力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政治使命,有助于人们特别是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更加明确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及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促进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能从“国之最大者”的生态政治高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强烈生态政治责任谋划好、实施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及“如何谋划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重大的现实生态政治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一系列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都体现了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谋划的生态政治站位和生态政治使命,彰显出浓厚的生态政治意蕴和生态政治智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生态政治考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的任务,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点任务聚焦于以“三大结构”为主体的调整优化上,旨在

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方面的结构调整,达到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和生态产品产业、积极推动资源节约与集约高效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构建形成多层次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的目的,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夯实结构基础。

关于“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的任务,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聚焦于服务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建设上,旨在通过进一步强调并着力运用好市场经济政策的激励功能以及标准手段的积极引导作用,实现完善体系和推进综合治理的目的,以利于充分发挥两者在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中的功能,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强大动能。

关于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以此实现“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以此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并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以此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开展新污染物治理,加快生态保护修复以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任务,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近期任务聚焦于“水气土”的三大攻坚战上,旨在通过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达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目的,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扎实基础。

关于“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等为重点”、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任务,有助于以系统性思维、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思维、战略性思维指导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达到持续开展重点区域自然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目的,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治理任务划清重点难点。

关于“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任务,有助于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科学合理设置,达到不断地健全和完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以及不断地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目的,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关于尽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和健

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的任务,有助于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水系源头地区、自然保护区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受益地区和保护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多种形式开展横向生态补偿,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出了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于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的任务,有利于达到促进生态修复和生态平衡的目的,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提供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总之,“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生态政治意蕴展示的既是一种谋大局、谋全局的生态政治视野,又是一种谋长远、谋未来的生态政治视野。“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一种谋大局、谋全局的生态政治视野,就是将全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就是着眼于生态禀赋和生态治理具有很大差异性、多样性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省份,既提出具有共性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又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和城乡之间的不同特点,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出各地的比较优势,在整体性的统筹协调中有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作为一种谋长远、谋未来的生态政治视野,就是要立足于当下,放眼于长远和未来,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优质均衡型、生态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建设,都看作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政治站位要做到以及要做好的事情。无论是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规划,还是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都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看作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提出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力,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点,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在实践中坚持先立后破、立破并举的基本原则,达到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目的。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生态政治意蕴既立足于国内,又着眼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最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最为典型

的全球性政治问题。酸雨、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全球气候异常变化以及淡水资源污染、土地资源污染、毒化学品污染和危险废物越界转移等，都会引发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的全球性危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都是关涉世界各国如何携手合作的全球性治理问题。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必须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合力保护好共同的地球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胸怀天下的广博生态政治视野，提出了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生态政治的国际化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这些繁重任务，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发展任务，又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大政治任务，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生态政治导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al View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Planning Development from the Heigh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ANG Shi-nan

(School of Marxism/Soochow Think Tank/China Urb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PRC)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of “planning for development at the heigh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view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and tasks of the tim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s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With the distinctive ecological political awareness, it answered the major ecological political questions of “what kind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to take” and “how to plan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journey of China. With a clear ecopolitical mission, it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eco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th the clear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olitics, it well draw a blueprint for ecological politics that combine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high qualit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tics of ecology;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ree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